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北京文化通讯

2014年第2、3期合刊
（总第20期）

本期要目

政策导览

■习近平就推进北京发展和管理工作提出5点要求

■北京市人大通过《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动态关注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

■北京市市长王安顺提出修改城市规划，治理“城市病”

媒体聚焦

■北京“城市病”的成因与治理

■来自“星星”的韩流

■“冯氏春晚”：国家定制与商业资本的暧昧联谊

尖峰观点

■林家彬：我国“城市病”的体制性成因

■葛丰：“大城市病”的根子在中小城市

海外视野

■德国克服“城市病”，推进“再城镇化”

■韩剧流行背后：以文化助推国民经济发展

研究院之声

■《文化研究》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全文收录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1. 政策导览

(1)政策文件

■ 习近平就推进北京发展和管理工作提出5点要求

2月25日，习近平在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市长王安顺陪同下，来到北京市就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首都更好发展特别是破解特大城市发展难题进行考察调研。2月26日，他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北京市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就推进北京发展和管理工作提出5点要求。

一是要明确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二是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特别是工业项目选择，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增强区域人口均衡分布，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三是要提升城市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形成适度超前、相互衔接、满足未来需求的功能体系，遏制城市“摊大饼”式发展，以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高度负责精神，打造首都建设的精品力作。

四是要健全城市管理体制，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尤其要加强市政设施运行管理、交通管理、环境管理、应急管理，推进城市管理目标、方法、模式现代化。

五是要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任务是控制PM2.5，要从压减燃煤、严格控车、调整产业、强化管理、联防联控、依法治理等方面采取重大举措，聚焦重点领域，严格指标考核，加强环境执法监管，认真进行责任追究。

（据北京市政府门户网站，2014年2月27日）

■ 北京市人大通过《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1月22日，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

《条例》规定，防治大气污染应当建立政府主导、区域联动、单位施治、全民参与、社会监督的工作机制。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大气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障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财政投入。市人民政府应当完善和落实城市总体规划，控制人口规模，优化空间布局，合理配置产业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减少生产、生活带来的污染。在大气受到严重污染，发生或者可能发生危害人体健康和安全的紧急情况时，市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启动应急方案，按照规定程序，通过媒体向社会

发布空气重污染的预警信息，并按照预警级别实施相应的应对措施，包括：责令有关企业停产或者限产、限制部分机动车行驶、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和建筑拆除施工、停止露天烧烤、停止幼儿园和学校户外体育课等。

（据《北京日报》，2014 年 2 月 12 日）

■ 北京市印发《北京市基层公益性演出活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为了规范和加强北京市基层公益性演出活动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近日，市财政局、市文化局制定印发了《北京市基层公益性演出活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本办法所称基层公益性演出活动是指由政府出资购买演出服务的文化项目，面向全市各区(县)开展，主要包括“百姓周末大舞台”和“周末场演出计划”两项。专项资金纳入市对区(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采取先演后补方式拨付，主要用于参加“百姓周末大舞台”、“周末场演出计划”的演出团体补助和演出场所补助。在演出团体补贴方面，“百姓周末大舞台”全市每年演出 291 场，每场演出补贴 20000 元；“周末场演出计划”全市每年演出 750 场，每场补贴 20000—35000 元不等。在演出场地补贴方面，“百姓周末大舞台”：无露天剧场补贴的区(县)每场演出补贴 5000 元；“周末场演出计划”：每场演出补贴 7000 元，票款收入归场地所有。

（据北京文化热线，2013 年 11 月 14 日）

(2)政策解读

■ 杨开忠：北京如何调整城市功能定位

随着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北京发展和管理提出新要求，首都北京即将迎来城市史上的一次大变革：伴随着首都城市功能定位的调整，一些非首都核心功能将被疏解。从北京城市功能的实际情况看，除一些面向全国的非首都核心功能外，部分科教文卫机构也可适当迁移。同时，聚集在北京的一些非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央企总部，也可以适度迁出。而对于由市场决定区位的经济机构，虽然仍有疏解空间，但成败难定。

北京可以疏解的非首都核心功能有两大类：首先，从经济角度考虑，一些相对低端、低效益、低附加值、低辐射的经济部门，如面向京津冀地区需求的经济部门，可以疏解到天津或河北；其次，区位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公共部门可以疏解。目前，北京市正在进行的功能疏解主要是第一类机构，但北京城市功能疏解可以把重点放在第二类上，也就是公共部门迁移上。这些机构并非都是首都核心功能的支撑，对于北京人口聚集却“贡献”很大。比如，每年仅外来人口就医就达到 5000 万人次，这也是造成中心城区交通、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原因之一。据悉，目前北京关于产业外迁的方案还没完全成熟，但大的方向是“挪工业、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资源”。也有人指出，北京人口聚集、交通拥堵是有原因的，所以首都功能疏解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见效的，而是一个缓慢持续的过程。

（据 21 世纪网，2014 年 2 月 28 日）

■ 李一戈：人为制造的城市病

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在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表示，将修改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据媒体报道，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改工作将于年内启动，重点之一是加强人口规模调控。

倘若新一轮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只是原有规划思想的重复，至多不过是修改一下人口规模控制目标，将 1800 万改为 2200 万，那将毫无意义。新一轮的总体规划修编，重点不应放在控制人口规模上，而应放在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布局的调整上。过去几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严重不足之处，就是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忽视。虽然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了加快发展新城，但人们看到的却是，新城只是作为房地产开发的重心迅猛展开，而不是人口、资源和产业的同步融入。

北京空间布局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副中心的缺位。可资比较的是东京都市圈，人口高达 3670 万人，但并没有北京这么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关键就在于它的几个副中心(新宿、池袋、涩谷、上野－浅草等)分散了城市的功能。北京并非对城市副中心全然无知。通州就被明确提出要建成北京的城市副中心，但如果没有资源的转接、产业的植入、消费的带动，副中心是不会自然生长起来的。何况，北京只有一个城市副中心是不够的。北京现阶段应该发展多个并且多元的城市副中心，应该但绝不止于写入新的城市总体规划，而且要有实质性的行动方案。

也就是说，未来北京要做的，不是简单地将市中心的人口向新城疏散，使之成为一个个新的睡城，而是要跳出原有的规划建设思路，立即规划建设几个功能完善的城市副中心，甚至包括纳入京津冀都市圈的北京卫星城。如果各个副中心既是自成一体的城市，彼此之间又能有机联结，功能互补，北京都市圈的人口哪怕增长到 3000 万，也没有那么可怕。

（据《21 世纪经济报道》，2014 年 1 月 22 日）

■ 高健：以城市群治理“城市病”

当前，北京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破解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难题，刻不容缓。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对 2014 年的工作安排中，促进京津同城化、京津冀一体化，引起委员们的热议。坚持高标准、大尺度、深层次，以突破难题为导向，以城市群治理“城市病”，达成共识。

同城化不是同一化，同城化是指一个城市与几个相邻的城市或地方，在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具备能够融为一体的发展条件，通过相互融合，促进共同发展；以存量资源带动增量发展，增强整体竞争力；以优势互补，相互依托，完善城市功能。“同城化”并不是人为的，这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造成的。同城化可以使城市实现强强联合，优势整合，“短处变长，长处更优”。这些城市打破了行政区域界限，通过资源优势互补，产业错位发展，设施共享和市场共建等，谋求各具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目

标都在于发挥各自优势，抓住机遇，促进共同协调发展。

加强首都生态圈建设是京津冀区域合作应有之义。从保护供水来源、抵御风沙侵袭和控制大气污染物等方面考虑，首都生态圈涉及天津、河北两地 166 个市(县)。应该通过创新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提高周边地区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便捷的交通，是区域一体化的基本条件，人才、资本才能流动起来。通过发展市郊铁路，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建设。市郊铁路在所有城市交通工具中运力最大、经济性最强、舒适安全度最高，是特大城市、城市群解决交通问题、城市布局问题、城市发展问题的最好甚至唯一方式。发挥中关村溢出效应促区域科技合作，建立国家的创新基础、重点发展战略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和现代农业示范。通过加大向周边省市的辐射可以提升首都的影响力，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经济分工；天津通过与北京的合作可以优化产业结构，增加生产利润，壮大特色产业；而河北通过京津的帮助，可以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通过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整个地区的生态文明。

（据《北京日报》，2014 年 1 月 16 日）

2. 动态关注

■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

2 月 27 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并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任副组长。这再次体现了中国最高层全面深化改革、加强顶层设计的意志，显示出保障网络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推动信息化发展的决心。

尽管此前国内外有过诸多猜测，但这一消息还是引发了中外媒体和网民的热切关注。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共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又一重大举措，是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国家战略迈出的重要一步，标志着这个拥有 6 亿网民的网络大国加速向网络强国挺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会上透露出来的信息显示，领导小组将围绕“建设网络强国”，重点发力以下任务：要有自己的技术，有过硬的技术；要有丰富全面的信息服务，繁荣发展的网络文化；要有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形成实力雄厚的信息经济；要有高素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队伍；要积极开展双边、多边的互联网国际交流合作。会议还强调，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要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向着网络基础设施基本普及、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信息经济全面发展、网络安全保障有力的目标不断前进。

（据新华网，2014 年 2 月 28 日）

■ 北京市市长王安顺提出修改城市规划、治理“城市病”

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 1 月 16 日上午 9 时在北京会议中心开

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杜德印、吉林、吕锡文、梁伟、柳纪纲、刘新成、李昭玲、唐龙、孙康林、叶青、刘迎、刘振东、宋慰祖、陆杰华、胡越、康春元、褚玉梅、蔡勉等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也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主持了开幕式，市长王安顺代表市政府，向出席开幕式的709名市人大代表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提出，坚持把新型城镇化作为治理“城市病”、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抓手，修改城市总体规划，推进经济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三规合一”，划定城市开发边界，优化城乡功能和空间布局，坚决扭转城市发展“摊大饼”，提升城镇化质量。推进中心城功能疏解。强化规划指导和控制，严格控制中心城建设规模和开发强度。加强配套政策研究，制定商品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引导服装、小商品、建材市场逐步退出。研究中心城优质公共资源和人口向新城疏解的利益引导机制，完善企业跨区县迁移管理办法，促进资源要素合理配置与生产力布局优化。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加大文保区保护修缮力度，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增强城市副中心和新城承载能力。把副中心、新城作为发展重点，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和生活环境，尽快建设成为优化城市布局的重要载体。编制通州城市副中心到2020年的发展规划，完成核心启动区重大基础设施主体工程，引进建设一批优质教育、医疗、文体等公共服务项目。

（据《北京日报》，2014年1月24日）

■《白日焰火》夺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廖凡加冕影帝

2月16日，第64届柏林电影节举行颁奖典礼。由刁亦男执导，廖凡、桂纶镁和王学兵主演的中国影片《白日焰火》荣膺最佳影片“金熊奖”，男主角廖凡也凭借此片的成功，获得柏林电影节影帝殊荣。

金熊奖是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高荣誉，与金狮奖、金棕榈奖并称为电影节三大最高荣誉象征。本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于2月6日至16日举行，共有23部电影入围主竞赛单元，包括《白日焰火》、《无人区》、《推拿》在内的20部作品参与竞争金熊奖。获得最高荣誉的《白日焰火》是一部犯罪爱情影片，讲述了一起由离奇碎尸案引发的桂纶镁、廖凡、王学兵三人的爱情救赎故事。

（据中国新闻网，2014年2月16日）

■ 深圳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挂牌

1月20日，深圳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挂牌。该基地的成立，使深圳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我国第三个、华南地区唯一获得基地授牌的城市。成功申办基地，是深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去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开创中华文化“走出去”新局面的重要举措。

基地将重点建设深圳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运营综合服务平台，为基地八个文化贸易专业平台提供配套服务，并配合相关单位做好基地主体园区和基地配套园区规划、建

设和运营工作，规划基地文化贸易专业平台体系，推动入驻基地企业与我国驻外机构及国外相关机构合作，为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进出口提供完善的文化贸易服务链平台体系支持。

（据《深圳特区报》，2014 年 1 月 21 日）

■ 两家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命名被撤

文化部日前下发通知，撤销广东省广州北岸文化码头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辽宁省大连普利文化产业基地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命名。

2013 年，文化部开展了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试验)园区考核和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巡检工作。广东省广州北岸文化码头因当地政府发展规划调整导致项目建设终止，不再具备作为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的基本条件，根据《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撤销其“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命名。辽宁省大连普利文化产业基地已转向经营其他行业，不再具备作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基本条件，根据《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撤销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命名。

为推进对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的动态管理，强化退出机制，促进优胜劣汰，自 2010 年起，文化部累计摘牌 3 批共 1 家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8 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据《光明日报》，2014 年 1 月 3 日）

■《2014 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公布

由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叶朗教授主编的《2014 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近日在 2014 第十一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中公布。

《报告》指出了 2013 文化产业发展的八大亮点：文化改革仍是国家力推重点，产业地位再次明确；2013 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预计将达 2.1 万亿元人民币，预计约占 GDP 比重的 3.77%，对社会经济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加强；在科技发展驱动下，传统文化产业形态面临深刻危机，急需在互联网数字时代寻求商业模式的创新和转型；文化企业并购、整合引关注；各路资金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的热情依然高涨，同时众筹融资模式出现，推动文化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以出版业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各行业跨越门槛完善产业链、丰富产品类型，产业成熟度得以提升；从全局来看，文化产业开始以“社会设计”的方式表现公共创意；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媒体技术广泛应用，大数据时代到来。

《报告》认为，近年来新闻出版业在获利方面有越来越艰辛的趋势。新闻出版产业的营业收入虽逐年稳定增长，但增长率有逐渐减缓的趋势。新世纪以来，中国国产电视动画制作量出现了持续的增长态势。直至 2012 年，国产动画首次出现了负增长，表明中国国产电视动画片的生产状态有回归理性的迹象。2013 年视频广告成为网络广告整体发展的核心之一。在表演艺术业，2013 年演出市场呈现两极发展状况，明星演唱会依

然火爆，但因 8 月下发的《关于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的通知》，加上改进会风的“八项规定”，导致演出承包商面临倒闭潮，从长远来看，将有益于行业的健康发展。2013 年节庆仍呈现增长之势，但受到节约办展的政策影响，会展数量增长幅度较往年趋缓。

（据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 年 1 月 14 日）

■“2013 中国文化产业年度人物”揭晓

1 月 18 日，由光明日报社主办的“2013 文化产业年度人物”推选结果在京揭晓。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宇，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长田，西安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建中，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刘庆峰，中国文化产业协会会长张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四达时代集团董事长庞新星，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依芳，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龚曙光等 10 位文化产业界杰出人士当选。

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蔡武在揭晓典礼致辞中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文化改革发展作出新的重大部署，特别是将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列入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领军人物的积极探索，要以“中国文化产业年度人物”推选为契机，充分发挥领军人物的带头作用，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创新发展。

（据光明网网，2014 年 1 月 18 日）

■“中国非遗年俗文化展示周”开幕

由文化部主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区政府承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年俗文化展示周”1 月 19 日在北京石景山体育馆开幕。文化部副部长董伟出席开幕式。

展厅由“序”和“笔墨绘春”“张灯结彩”“舞动春风”“雕福塑瑞”“锦绣前程”“点石化金”“品味醇美”8 个单元构成。集中展示与年节文化密切相关的剪纸、年画、灯彩、风筝、面人、泥塑、香包、织锦、陶瓷、漆器、茶叶制作等近 80 个传统美术和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郎志丽、吴元新、高凤莲等 80 多位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精湛技艺。

截至目前，已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 34 个民族的 53 个传统节日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大批与传统节日密切相关的项目如年画、剪纸、灯彩、风筝制作技艺等列入了国家级名录。

（据《中国文化报》，2014 年 1 月 20 日）

■ 北京青年影视创意基地挂牌

北京青年影视创意基地签约仪式暨挂牌典礼 1 月 9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基地由

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龙世文化集团创办。同时在北师大教育基金会成立“青年影视创意基金”，资助青年人才。

北京青年影视创意基地由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霍建起、高群书以及邹静之、刘文、陈晓卿等业界精英担任监制，指导创意作品的拍摄。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毕业生、凭借短片《酥油灯》夺得台湾金马奖等多项大奖的胡伟，成为第一位与基地签约的青年艺术家。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创始人黄会林教授表示，基地将以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为平台，汇聚优秀创意，实现市场对接。

（据《中国青年报》，2014 年 1 月 14 日）

■ 2014 第十一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北大开幕

1 月 11 日—12 日，以“文化的力量：文化市场与改革红利”为主题的 2014 第十一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开幕。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在发言中指出，文化创意产业是消费驱动产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系统论述，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正处于升级转型的关键时刻，必须要实现三个转变：从政府主导逐步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从以规模增长为目标向以质量效益为目标的转变、从文化产业自身发展向国民经济体系整体发展的转变。文化产业可以渗透到各行各业，带动各行各业的升级与发展，所以在文化市场方面要考虑活力、动力、魅力、潜力、合力的共同推动。

在主论坛中，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阎晓宏、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淼、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世界城市文化论坛发起人保罗·欧文斯等嘉宾也围绕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版权价值的实现等问题发表了高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入手进行了深入探讨。

（据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 年 1 月 16 日）

3. 媒体聚焦

■ 北京“城市病”的成因与治理

编者按：2014 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城市病”写入其中，显示出治理这一发展难题的信心、决心和勇气。然而，破解“城市病”，建设“宜居城市”，不仅需要发现其弊端，更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深挖“城市病”的成因，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包括人口膨胀、交通拥塞、就业困难、住房紧张以及空气恶化、土壤污染、水资源紧张等顽疾在内的“城市病”，已经侵扰了我们城市生活的效率、安全和健康，蚕食了城市经济社会应有的舒适、便捷以及城市人的幸福感(周飞飞：《治疗“城市病”离不开地质

药方》,《中国土地资源报》,2014 年 1 月 25 日)。有一些地方的新城建设,并没有按照市场规律来进行,而是“旱地拔葱”式的发展,造成了土地、资金等资源的错配,以至于“睡城”成为它们的代名词(欧甸丘等:《从“回龙观现象”看造城运动之弊》,新华网,2014 年 2 月 27 日)。

探究问题的成因,有评论者认为“大城市病”的根子在中小城市,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小城市就业机会不足,且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当然,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靠中小城市加快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还要依靠中央主导下的地方均衡发展战略有效引导,以及大城市地方政府以开放的心态,通过更大力度的“引进来”、“放出去”,更好地发挥龙头带动及辐射、反哺作用(葛丰:《“大城市病”的根子在中小城市》,《中国经济周刊》2014 年第 4 期)。在以往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总是大干快上,认为越多越好,越大越好,扩张就是王道。如今咂摸出些许味道,城市并不是无穷的加法,也需要适当做下减法。削弱大城市的吸引力,减少城市职能,以达到疏解中心城区功能和人口的目的。这就是在做“减法”。应该有意识地向中小城市增加投资,提高其交通、能源、城市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的投入,让这些转移的职能在当地同样便利地发挥作用,让跟随这些职能转移的就业人口能在当地扎下根来,甚至不断壮大成为当地城市发展的主力军。这是中小城市应做的“加法”(朱世衡:《治“大城市病”需用“加减法”》,《中国国土资源报》,2014 年 2 月 11 日)。

治理大城市病,是一个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很多“创新”其实还处在法律和政策的“禁区”,比如城里人到农村买地建房的“逆城镇化”就被住建部赫然拒绝。对大城市人口进行调控,依靠市场准入和价格杠杆,通过控制产业规模来控制人口规模,这只是其中一个办法。赋予某种流动自由,探索农地改革的 N 种可能性,尊重个体的“逆城镇化”选择以及随之而来发生的人口向外集聚,未尝不是人口调控的另一种思路(韩哲:《大城市病和制度创新的赛跑》,《北京商报》,2014 年 1 月 23 日)。

■ 来自“星星”的韩流

编者按:今年年初,随着韩国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在国内网站热播,一股“韩流”再次席卷中国。面对来势汹涌的外国文化,不管是不假思索的拒斥,还是盲目追捧,都一样有碍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进步。如何从别人的成功中汲取经验,改进自身的发展战略才是最应该思考的问题。

从传播方式上看,《星星》与以往热播的韩剧略有不同。曾经的《蓝色生死恋》、《浪漫满屋》、《冬日恋歌》等都是由电视台整版引进,再由电视台播出,但此次《星星》在网络上的播出,与韩国首播几乎同步,每周更新 4 集。正如百度董事长兼 CEO 李彦宏所说,《星星》的热播反映了网络对文化产业的影响,而这种变化将会更加明显。该剧最初只是在年轻人中传播,后来逐渐吸引年龄大的人关注,最后是在全人群中流行的趋势

(李彦宏：《网络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将会更明显》，财经网，2014 年 3 月 6 日)。

从电视剧的生产方式来看，《星星》也给我们带来了新思路。充分的前期准备、健全的制作体系、严谨的制作流程，以及隐藏在每一个环节中的强烈的竞争意识，构成了韩剧成功的有力保障。随拍随播的模式，使得收视率成为电视剧去留的最高标准——电视剧播出的长短、档期由收视率决定，收视率低的电视剧很有可能面临缩短时间、甚至停播的境遇(纳狄：《〈来自星星的你〉再引韩流》，《经济观察报》，2014 年 3 月 5 日)。此外，随拍随播的制作模式，也为观众互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拍摄过程中，创作者可以根据观众反馈，调整剧情设计，从而收到更好的收视效果。

当然，好的故事，也需要以一个恒定、正确的价值观为核心，《星星》中真挚、善良、美好的情感正是其吸引人的关键所在，而这也给那些充斥着腹黑、比坏和暴力的影视作品树立了一个正面的榜样。但是，当亚洲观众疯狂追捧《星星》的时候，欧美地区却对这部来自韩国的电视剧反应冷淡。他们普遍认为，巨大的文化差异造成了东方“星星”西方遇冷的窘境(《〈来自星星的你〉欧美遇冷：爱情故事不新鲜》，新华网，2013 年 3 月 5 日)

■“冯氏春晚”：国家定制与商业资本的暧昧联谊

编者按：2013 年 7 月，冯小刚接过了马年“春晚”总导演的聘书，一时间，很多人都对“冯氏春晚”的创新充满了期待。然而现实总是充满了反讽，“冯氏春晚”最终以 9.032%收视率再创新低。在四个多小时的直播中，网友吐槽声不断，构成了除夕夜里的一道别样风景。

“春晚”创新一直是个难题，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春晚”本身是一个具有极高政治涵义的文化产品。就像新闻联播一样，它带有强烈的政治教化作用，传达中国文艺领导层对于现实的看法，并且带有着浓重的统战功能(连清川：《乱如乱纪元》，中国甘肃网，2014 年 2 月 25 日)。“春晚”作为一场“国家定制”，必然有很多制度性的因素不可移除。创新匮乏的很大原因可能是有太多东西动不得，有各种不能缺的主题，如民族大团结、国粹表演、照顾老人和小孩的节目、道德模范宣传……对积习沉重的“春晚”来说，不出大格，必然也就难出大彩(李雪萌：《冯氏春晚：不出大格必难出大彩》，《济南日报》，2014 年 2 月 7 日)。经过 30 多年的演变，“春晚”已成为一个高压下的模块，谁进去都被塑造了出来，它已难逃被体制“格式化”的宿命。(《冯氏春晚为什么还是难有起色?》，《羊城晚报》，2014 年 2 月 17 日)。

另一方面，资本利益的干扰也成为“冯氏春晚”为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作为资本的代言人，冯导有可能是成功的，浓郁的华谊年会味道，让人领教了资本欢场的风情；但这也是有代价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撕去之后，艺术家的使命和风度不免减了成色(王南：《冯氏春晚是资本欢场艺术墓地》，《中国经济报》，2014 年 2 月 10 日)。也有人表达出更

尖锐的批评，要求央视“春晚”剧组公正行事，指出冯小刚以总导演身份，为他做大股东的华谊兄弟公司爆敛红利，把马年“春晚”办成了史上最烂的文化烂尾楼，相关部门必须问责。(肖鹰：《驳华谊回应冯小刚春晚谋私》，作者博客，2014 年 2 月 2 日)。

当然，也有更加宽容的声音提出，今天我们可以刷微博、看微信，看电视已经不再是人们的必须选择。越来越丰富的生活，使得单纯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的人越来越少了。于是，收视也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春晚”收视低了，但错不在冯小刚，而在于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这是种透着幸福感的变化(蓝恩发：《冯氏春晚创 10 年收视最低——评：错不在冯小刚》，《沈阳日报》，2014 年 2 月 13 日)。张颐武则认为，“春晚”仍然是春节时段的无可置疑的主要节目，但它不过是中国电视文化的一个方面而已。它仍然不可缺少，却不可避免地从我们“目不转睛”的凝视中退向了我们春节生活的一种“伴音伴影”。它的存在仍然有意义，却没有了那么大的意义(张颐武：《从“目不转睛”到“伴音伴影”：我们的“春晚”观的变化 》，作者博客，2014 年 2 月 15 日)。

4. 尖峰观点

■ 林家彬：我国“城市病”的体制性成因

我国的“城市病”除了拥有与其他国家的“城市病”相同的成因之外，还具有许多我国特有的体制性成因。以下分别从干部选拔机制和政绩考核体系、财税体制、土地制度、规划体制、中央地方关系等角度展开分析。

从干部选拔机制和政绩考核体系看，偏重于经济指标的考核体系给城市发展带来了明显的影响。首先是导致城市功能的过度集中。在那些各项功能原本已经高度集中的特大城市，城市政府为了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仍然大力鼓励产业功能的集聚，积极吸引大型项目的落户，拒绝产业功能的向外转移，结果导致城市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的不堪重负。其次是导致重“面子”轻“里子”，重形象工程轻民生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是显绩，容易被关注和纳入评价考核，往往得到优先发展；而城市排水系统等“里子”工程、扶危济困、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是潜绩，发展往往滞后。最后是导致城市政府“亲商”有余而亲民不足，公共利益往往让位于商业利益，超出规划强度的商业地产开发导致周边的基础设施容量不足，成为引发“城市病”的重要原因。

从财税体制角度考虑，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的不相匹配，使得城市政府千方百计地寻求税收以外的收入来源，“城市经营”大行其道。以企业相关税收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税制结构，使得地方政府为了扩大税源而千方百计地招商引资，城市政府也不例外。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的地方财政收入结构，在客观上成为大城市住房价格不断上涨、房地产调控政策难以收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土地制度角度分析，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为城市圈地卖地创造了便利条件，同时，也是城市政府可以方便地采用“饥饿”方法限量供地，人为制造卖方市场，导致地价

飙升，从而实现土地增值收益最大化的重要制度基础。另外，现行土地制度对于城市政府扩大拆迁规模、搞大拆大建也具有激励作用。

从规划体制角度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规划本身的科学性不足、规划缺乏权威性、规划的时效性有待改善、城市规划过程缺乏公众参与。由于规划体制存在着上述的多方面问题，规划不仅没能够成为限制权力的滥用、保障城市沿着科学理性的轨道发展的制度工具，相反还成为可以被权力随意利用的工具，成为助长“城市病”产生和恶化的重要原因。

从中央地方关系角度分析，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在政治上保持强大控制力的体制特征，对于城市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在首都北京有突出的表现：首先，给城市基础设施增添了额外的负荷。由于中央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行政审判权、资源配置权，地方政府“跑部钱进”成为常态化的需求，这种需求造就了“驻京办现象”，从而加大了对城市基础设施等各类资源的压力。其次，给城市的规划管理造成“真空地带”。对于中央政府以及军队各部门的建设行为，北京市政府的规划管理很难起到有效的规制和引导作用。最后，北京市政府在城市的运营管理等相关资源的配置上，以保障中央政府的工作运行为第一要务，这就难免造成直接服务于城市居民的资源在局部地区、个别时段的不足。这些问题虽然以北京最为突出，但在省会城市中也有所存在，只不过其程度有所差别。

（据林家彬：《我国“城市病”的体制性成因与对策研究》，《城市规划学刊》，2012 年第 3 期）

■ 葛丰：“大城市病”的根子在中小城市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正处在历史性的转折关口，尽管存在日益增高的落户门槛，但农村人口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依然极为迅猛地由邻近中小城市转向大城市与特大型城市。其结果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方面是，曾经长期人为制造身份割裂的城乡户籍分立制度，起码在全国多数地区基本已不再构成挑战性的课题；而忧的方面是，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人口总量和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大城市病”乃至“拉美陷阱”的潜在可能性，迫使相关城市政府人口管理首鼠两端。

然而，以户籍为基础的行政管控手段，很难扭转“大城市病”不断加剧的总体趋向。其一，就人口总量来看，大城市独具的集聚效应、乘数效应使其得以几何式增殖就业岗位(譬如中国的三大都市圈，以不足全国 5% 的土地面积，创造了 40% 以上 GDP 产出)，再加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公共服务极化现象，人口加速向大城市单向度流动，不仅合乎个体理性，而且也是劳动力与资本优化配置规律使然。其二，就人口结构维度来看，当下大城市的人口管控无不暗含“迎优驱劣”的政策意图，但问题是，歧视性的户籍壁垒在劳动力市场存在显著分层模式的情况下，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因为户籍壁垒对于竞争性不强的低端就业岗位，影响相对较小，真正受到干扰的，反而集中在需要较高受教育水平和技能的高收入行业。例如，种种数据表明，近年来大城市中受教育水平越低的外来人口，其工资水平反而越快地趋近本地居民。

在迁徙自由不可能再被逆转的今天，人口流动归根结底由个体经济理性所决定，因此，这就要求决策者必须意识到，“大城市病”的根子在中小城市，大量人口的跨地区流动，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小城市就业机会不足，且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当然，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靠中小城市加快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还要依靠中央主导下的地方均衡发展战略有效引导，以及大城市地方政府以开放的心态，通过更大力度的“引进来”、“放出去”，更好地发挥龙头带动及辐射、反哺作用。

（据葛丰：《“大城市病”的根子在中小城市 》，《中国经济周刊》，2014 年第 4 期）

■ 周牧之：以“模块城市”探索新型城市化道路

1949 年以来中国政府推行的重工业化政策、农村工业化政策、小城镇政策都没有认识到人口和产业向大城市集中的必然性，这些政策限制了产业投资和人口移动的自由，抑制了大城市的发展。随着企业在投资选址上实现自由化，大城市群的产业集聚迅速膨胀。全球供应链型产业集聚的高速发展诱发了人口向大城市群的大规模迁移。然而户籍制度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却严重地局限了中国政府的政策思维，使政府一直不能面对产业和人口向大城市、大城市群集中的现实。在没有政策和制度应对的情况下，巨大的城市空间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地自发地高速膨胀，引发了大量社会经济矛盾和问题。

中国大城市群面临的最大课题首先是如何接纳庞大数量的人口迁移。在制度化的二元社会的制约下，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滞留在城市却无法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工作和生活上受到了各种限制和歧视。农民工的收入也长期被压制在极低的水平，更是被置身于城市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之外。这种分割的社会结构使中国的收入差距和社会福利差距固化和扩大。更严重的是，农民工进城使两个不同身份的群体汇聚在同一城市空间生活，更加凸显了社会的不公和矛盾。

大城市群的集聚效应是其发展的原动力，同时巨大的集聚也给大城市群带来了深刻的负效应。中国大城市群人口的规模之大、密度之高都堪称世界之最。高密度、大规模的人口带来的慢性交通堵塞、长时间通勤的常态化、居住环境的低劣和热岛效应等现象正严重地困扰着大城市群。

为破解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化解上述的城市病，最近本人正在与一批有志同仁从事运用“多规合一”和“模块城市”的手法综合实现智慧城市、生态城市、立体城市、紧凑城市、节能创能城市、创新城市的探索。2012 年，在位处长江三角洲的江苏省启动了镇江生态新城项目，拟在 220 平方公里的规划区内建设百万人口规模的生态新城。该规划以路面电车作为生态新城的基本交通网络，将开发面积限制在新城规划面积的 35％，把 65％的面积留给农田、水泽和绿地等生态空间，力图打造产城互动、智能、节能、创能、生态、宜居的崭新城市模式。

（据周牧之：《以“模块城市”探索新型城市化道路》，《经济参考报》，2013 年 12 月 6 日）

■ 张玉林：当今中国城市信仰形成的原因

19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城市信仰——表现为对城市和城市化的坚定追求，核心又在于大城市崇拜。作为一种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官员的执政目标，它推动了此后的城市化大跃进浪潮，不仅使中国的“城市病”更加严重，也促成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和乡村改造运动。这里从三个方面来寻找城市信仰形成的社会条件。

首先，“更美好”说法的社会基础，应该是一国两制、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及其造成的巨大的城乡差距。这种不平等的制度和政策带来了当今世界最大的城乡差距，是需要消除或缩小的。但是人们却没有意识到它的另一个历史后果，即对中国人的城乡观念的扭曲：由不平等的制度导致的“优”与“劣”，反而被当作城市天然地优于乡村的逻辑起点和现实根据，现代化就等于城市化，城市等同于发达、文明、进步，乡村则显得贫困、落后，甚至愚昧。而“更美好”的宣言不仅完成了对于不平等制度的追认，也实现了对不合理现状的再定义和强化。

其次，关于城市信仰得以形成的政治动力，则来自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主义并非当今中国所独有，中国的贡献或“创新”之处在于把发展主义推到了极致，从而也就滋生出中国独特的城市信仰和大城市崇拜。而在当今中国，由于“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史情结更为牢固，通过经济增长维持制度合法性和社会稳定的需求也更高，对“发展”的追求也就更为迫切和执着。这也就使得发展主义的中国版呈现三个特征。一是至高无上性、排他性，“发展”成了宗教，是压倒其他一切道理的“硬道理”，它的许多恶果只被轻描淡写地说成“发展中的问题”，强调“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二是对速度的追求异常明显，演化为发展焦虑症，“发展太慢等于不发展”，“以快发展为荣，以慢发展为耻”，“跨越式”、“超常规”、“又好又快”等，都是反映这种精神疾患的典型说辞。三是对高速发展的追求具有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特征，“宁可毒死、不愿饿死”，“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就影响他一辈子”，“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之类的宣言或主张，都是例证。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使原本具有“正能量”的发展主义释放出巨大的破坏性，甚至毁灭性。

最后，催生城市信仰的第三种力量是巨大的利益驱动。利益本身强化着观念，也驱动着资本和权力。对利益和利益主体进行必要的分类，就会看到，这里的利益既包含发展主义所强调的国家或区域层面的，以及“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公共利益，也包含着政府和政府部门的利益、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以及资本或房地产商人的利益，甚至作为城市化大跃进的鼓吹者、为“做大做强”或“规模效应”提供“经济学依据”的专家学者们的利益。

（据张玉林：《当今中国的城市信仰与乡村治理》，《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0 期）

■ 刘士林 ：以礼乐文化重建应对新型城市病——雾霾

雾霾超越了自然和气候异变的范畴，具有越来越鲜明的“城市病”特征，它既与城市

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也涉及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心理感受，在本质上是一种复合型城市病。生产方式上的工业化和生活方式上的都市化，是导致中国城市雾霾病的两大现实根源。改造城市生活方式，应成为“中华城市梦”的核心内涵。

改变城市生活方式有两种渠道：一是在“技”的层面上，如伦敦市民，出行时主要使用公共交通，住房尽量使用太阳能和可再生资源。如后现代城市设计中的“3R”原则，即减少资源消耗(Reduce)、增加资源的重复使用(Reuse)、资源的循环再生(Recycle)。二是在“道”的层面上，主要是通过文化教化改变人贪婪和不健康的欲望结构。如果说前者是西方人的特长，那么后者就是中国文化的利器。尽管精神文明建设本身不创造物质财富，但由于它有效地降低了人的过剩和奢侈欲望，直接减轻了整个社会生产与分配环节的巨大压力，所以也就等于提高了生产力和增加了生活资料总量。

改造我们的城市生活方式，应成为“中华城市梦”的核心内涵。一方面，以克制在现代化进程中过分膨胀的现代性欲望为基本手段，它传承了中华民族最珍贵的优秀人文思想和高尚精神，为我们在城市化背景下选择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历史文化与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以改造主体为基础尽可能减少城市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冲突，还昭示了一种自然和社会可承受的新型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并有助于解决当下全球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和城市危机。

（据刘士林：《以礼乐文化重建应对新型城市病——雾霾》，《中国名城》，2013 年第 4 期）

■ 张孝德：伦敦治理雾霾的经验与反思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同时也是最早遇到环境污染事件的国家。1952 年 12 月 4 日至 9 日，大范围高浓度的雾霾笼罩伦敦，有 4700 多人因呼吸道疾病而死亡。大雾之后几个月，又有 8000 多人死于非命，此次事件成为 20 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一，给英国社会造成很大冲击，是促使英国痛下决心治理雾霾的导火索。

面对严重的空气污染，严格的环境立法成为英国治理雾霾问题的首选。1954 年以来，英国和伦敦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以消除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和日常生活的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生活污染中的交通污染取代工业污染成为伦敦空气质量的首要威胁。当时，英国政府在城市生活排放治理上主要做了以下工作：首先，通过一系列措施严格限制小汽车尾气排放；其次，加强绿化；第三，多部门、各层级联合治理；第四，实时监控空气质量，及时公布监测结果。无论英国在内部采取怎样严格的强制性治理污染的管理制度，都无法解决不断扩展的经济总量和高消费带来的污染总量的增加。在英国工业化的后期，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采取了从高能耗产业向低能耗产业升级，以及利用贸易实现污染输出的办法。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英国治理之路，有许多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学习。首先，在治理雾霾的前期，从遏制工业污染着手，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做法。其次，英国雾霾治理属于外部治理、不可持续的治理模式，是中国不能重复的治理之路。第三，2008 年新能

源革命以来，英国从能耗结构、绿色消费和绿色产业着手的新探索，值得我们关注。但是，中国要走出西方式的“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治理思路，不仅要找到造成雾霾天气的直接原因，还需要从发展模式的视角探索造成迷雾的深层原因。

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一)中国经济增长陷入成本大于收益的困境。雾霾天气主要发生在大城市区域，但却是整个经济增长方式、能源结构、生活方式、城镇化模式等系统整合作用的结果。(二)GDP 主义的增长成为目标迷失的增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GDP 增长与国民福利的增长，就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导致了其负福利效应比正效应还要大。(三)中国继续走西方式污染转移之路已经行不通。当今中国雾霾污染是在全球环境危机一触即发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是在世界环境容量已经饱和，没有承载空间的情况下出现的。

（据张孝德：《从伦敦到北京：中英雾霾治理的比较反思》，《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 年 02 上）

5. 海外视野

■ 德国克服“城市病”，推进“再城镇化”

近年来，德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是，迁往以柏林、汉堡、法兰克福、科隆、斯图加特、慕尼黑等大城市为核心的地区。据 2012 年柏林市城市规划局统计，2011 年柏林人口约为 350 万，到 2015 年将达 360 多万。而在这期间，德国人口总数呈下降趋势。过去 5 至 10 年，再城镇化的趋势在德国非常明显。

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城镇化达到阶段性顶峰。城市人口激增、居住条件不理想、交通拥堵、环境质量差等“城市病”也随之出现，并驱使人们离开都市的尘嚣，到城市周边地区寻觅清静。德国城镇化由此也经历了向郊区发展的阶段。

时过境迁，德国的城市眼下又开始焕发活力。便利的生活、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好的居住条件和基础设施再次吸引人们迁回城市。互联网、电子邮件、手机等现代通信技术出现之后，曾有专家预言，地理位置不再成为限制人们的因素，在哪里生活“都一样”。然而，现实发展却走向了另一面，人们反而更倾向于聚集在城市生活。这是因为城市生活更能给人一种活在当下的归属感。另外，城市生活也能更好地把工作和生活结合在一起。在人们过足“自然瘾”后，城市里日益便利的医院、学校、购物中心以及剧院、电影院、体育馆等文化设施，促使人们再度选择在城市居住生活。这一过程是在城市发生悄然变化的同时发生的。因为污染工业逐步外迁、公园和绿地增加，城市的环境也得到了明显改善。自然环境不再是乡村的专利，在城里也触手可及。

人们回流城市，势必对城市承载能力造成新的压力。目前，德国大城市房价连续上涨，已经引起民众不满。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城市生活，城市能否继续保持现有的生活质量，十分关键。为此，许多城市都在加快住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柏林市内就有很多工

地正在建设之中。城市生活的质量，还要与人们生活理念上的变化相吻合。德国在城镇化过程中曾经历过让城市适应汽车的发展阶段，但目前在很多欧洲城市，让城市适应自行车成为流行趋势。骑自行车上下班不仅绿色环保，还可以让人无需制订运动计划就达到每天锻炼身体的目标。在考虑城市发展的时候，还要有“区域眼光”。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经济和产业以及资源特色，区域的发展要符合当地特点。

（据黄发红：《德国克服“城市病”，推进“再城镇化”》，《人民日报》，2014 年 1 月 23 日）

■ 韩剧流行背后：以文化助推国民经济发展

韩剧能够有今日的影响力，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在背后支撑它们的，不仅仅是韩剧的产业生态圈，更有着以文化经济助推国民经济发展的“韩国定位”。韩国是一个娱乐文化产业异常发达的国家，据说韩国国内直接和间接从事娱乐文化产业相关工作的人数，占到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文化产业的发展完全关系到韩国的国民经济，因此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韩国政府不仅在国内不断通过各种政策、机制的完善助力娱乐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在韩流文化向全世界范围的传播中，担当起了保驾护航的重要角色。而韩剧，正是韩流文化向海外输送的“排头兵”——和电影、演唱会这样的文化形式相比，电视剧在亲民性和大众化上占有明显优势。

韩剧的流行，带动的当然不仅仅是演员们的走红，还有巨大的“韩剧经济”。韩剧中出现的剧情拍摄地，诸如南山塔、弘大、明洞、泰迪熊博物馆、济州岛等大量地点，都成为了热门旅游景点。根据一部热门韩剧的拍摄地，专门设计一条旅游路线的做法也很常见——最新的《来自星星的你》旅游路线就早已新鲜出炉。绝大部分韩剧都是边拍边播，每周只播放两集。周播剧的好处，是能够迅速收集观众对电视剧的反映，并在拍摄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调整。相对的自然是拍摄难度的提升，以及在为期几个月的制作播放期内，整个剧组的超高强度工作。

韩剧的制作播放主力是韩国三大公共电视台——KBS、SBS 和 MBC，三家电视台常年在韩剧的国内播放市场和海外发行市场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为了打破报纸、电视、网络、通讯之间融合的屏障，韩国政府在 2010 年底授予了韩国四大报纸及其相关新闻机构开办有线电视台的许可。在随后的 2011 年 12 月 1 日，多家综合编成频道相继开播，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 JTBC、Channel A 和 TV 朝鲜。这些新开播的有线台，使得韩国电视剧市场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无论是政府的政策扶植，还是内外部激烈的市场竞争，都是加速韩剧制作界发展的外因；而韩剧制作产业整体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才是韩剧总是精彩不断的内因。如今，一部好的韩剧，已经不仅仅是剧情能够吸引人，男女主角的角色魅力和演员魅力迷人那么简单了，从原声音乐、画面、特效，到造型、布景等，韩剧的细节之美，已经成为牢牢抓住观众的核心竞争力。

（据木星：《韩剧流行背后：以文化助推国民经济发展》，《新民周刊》，2014 年第 9 期）

■ 英国“三板斧”力推创意产业

1月14日，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在其官网发布最新英国创意产业经济评估报告。数据显示，创意产业每年为英国经济带来714亿英镑收益，相当于每小时就有800万英镑入账，创意产业在2012年的总收益增长9.4%，超过英国其他产业，成为增速最快的产业。与此同时，创意产业还为168万人提供就业岗位，占英国总就业人口的5.6%。

英国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创意产业理念的国家，也是第一个用政策来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国家。英国被视为设立了创意产业的“黄金标准”，即政府以增加培训、融资倾斜、推动立法等方式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英国创意产业的不断发展，与政府审时度势制定出的相应政策分不开。这些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使创意产业各领域得到顺利平稳的发展。首先，创意人才的培养成为英国创意产业的命脉。英国自上而下努力为年轻人提供接受创意教育的机会，向他们传授适应创意产业需求的工作技能，为年轻人提供在创意部门工作的机会等。其次，减免税收的政策成为英国创意产业发展的动力。为支持电影制片人的创作，英国政府从2007年起正式实施英国电影税收减免政策。2012年，为鼓励电视、动画片和游戏业创作，英国政府宣布，精品电视节目、动画片和游戏的创作者从2013年4月起也可以享受到类似的减税政策。最后，推动立法是英国政府为亟须得到保护的创意产业保驾护航的重点，陆续通过的法案有《广播法案》、《通讯法案》、《电影法案》等。2012年10月起，英国开始实施《现场音乐法案》，简化现场演出的审核流程，甚至对一些类型的表演免去审核。

（据樊炜：《英国“三板斧”力推创意产业》，《中国文化报》，2014年1月23日）

6. 研究院之声

■《文化研究》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全文收录

近日，由我院常务副院长、首席专家陶东风教授与南京大学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周宪教授联合主编的学术期刊《文化研究》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全文收录。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是“十一五”国家重大网络出版工程的子项目，是《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出版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收录内容以学术、技术、政策指导、高等科普及教育类期刊为主，内容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

《文化研究》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联合主办，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是国内唯一的文化研究类学术集刊，2008年被列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创刊以来，刊物本着学术独立的原则，在质量上坚持专业化、精品化、国际化，已成为国内一流的文化研究刊物，声誉卓著。此次收录充分体现了《文化研究》的学术质量和业内影响，将有效推动文化研究领域学术期刊的发展，增进学术交流。

（本期摘编人：朱楠、郭云娇）